

# 張作霖的英籍顧問——端納與沙敦

唐啓華\*\*

關鍵詞：張作霖，英籍顧問，端納，沙敦

Key Words : Chang Tso-lin, British Advisor, W. H. Donald, F. A. Sutton

## 一、前言

軍閥與列強的關係，一向是民初歷史研究的重點之一。但是過去太過強調軍閥為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傀儡、走狗，也太強調某軍閥與某特定列強的關係。事實上，所謂「軍閥」與列強的關係頗為複雜，常是互相利用，不一定是主子與走狗；而一個軍閥也不一定只與一個特定列強往來。以張作霖為例，他被認為與日本關係密切，並聘用了許多日籍顧問。但近來研究已闡明他並非日本傀儡<sup>(1)</sup>，而張作霖與其他列強也有往來，尤其是英國。<sup>(2)</sup>本文試圖由英國外交檔案及英國外交官私人文書等一手史料，參酌前人著作，考察張作霖與其英籍顧問的關係，做為探索「外籍顧問與近代中國」這個大問題之下的個案研究。

張作霖是控制北京政府的最後一位軍閥，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後，以勝利者姿態入京。總統曹錕辭職後，經各方協調，由段祺瑞任「臨時執政」主持中樞，張作霖則與馮玉祥暫時維持均勢，並沿津浦鐵路伸展其勢力，直抵江南。1925年秋遭孫傳芳擊敗，失去蘇皖地盤；11月又發生郭松齡灤州回師，張幾乎失敗。1926年初張作霖重整旗鼓，再率奉軍入關，與吳佩孚棄嫌修好，共逐馮玉祥「國民軍」出北京。4月馮部離京前迫段祺瑞下野，張、吳共掌北

\* 本文初稿曾於1997年4月26日於「外籍顧問與近代中國討論會」宣讀，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存恭指正，提出許多寶貴意見，並提供相關資料，筆者參酌其意見修成本文，特此致謝。

\*\*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 參見水野明〈所謂「滿蒙懸案交涉」と張作霖の對應〉，收於鄭樑生編〈第二屆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系，1992年）。
2. 參見 Chi-hua Tang, Britain and Warlordism in China: Relations with Chang Tso-lin, 1926-1928, 〈興大歷史學報〉第二期，1992年3月，pp.207-230。

京實權，任命所謂「攝政內閣」維持中央政府門面。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吳佩孚率部南下應戰，北京政府遂由張作霖掌控。12月張在天津就任「安國軍」總司令，翌年6月開府北京，出任軍政府「大元帥」，到次年6月離開北京，在皇姑屯遇害。

張作霖基本地盤在東北，主要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因此與日本有特殊的關係。但他自1925年起致力於爭奪對北京的控制，也因此想加強他與西方各國的關係；尤其是當時在華擁有最大利益，並一向支持北京政府的英國。然而英國自1925年五卅慘案後，已逐漸修正其對華政策，以較自由與妥協的態度，來應付中國民族主義的攻擊；對北京政府已不再那麼重視。張作霖與英國的關係在此背景之下展開。

## 二、張作霖的英籍政治顧問端納

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是近代中國政壇上鼎鼎大名的外籍顧問，其祖先為蘇格蘭人，出生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1902年由澳洲抵香港，擔任德臣報(China Mail)記者。辛亥革命時曾協助革命黨人，北洋政府時期又贊襄各個當權者；參與過洩漏日本二十一條要求內容，鼓吹中國參加歐戰等重要事件。<sup>(3)</sup>由於他與中國各方都有來往，知道許多內幕消息，當時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即稱端納「由於和新中國領導人密切接觸，對中國事務非常熟悉，他和他們在軍事和政治運動中緊密合作。他對中國人非常誠摯，就好像他們是自己的同胞一樣，他為他們的困難發愁，並且與他們患難相共」。<sup>(4)</sup>他又與歐美駐華使節熟諳，其報導頗具權威性，先後被邀擔任英國著名的《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記者，及倫敦《泰晤士報》(London Times)駐北京通訊員。端納於1920年被北京政府聘為顧問，同年受財政總長周自齊委託，主持「經濟討論處」(Bureau of Economic Information)，「每週發行中英文經濟週刊(Economic Bulletin)各一份，乃是活頁式，約七、八頁，分段蒐集擇錄國內外有關財經變動的新聞和調查統計，凡對此有興趣的機關和官民，都可免

- 
3. 端納在華事跡見 Earl Albert Selle, *Donald of China*, Sydney, 1948; 中譯本見徐慰曾等譯，《端納傳》，(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
  4. Paul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New York, 1922, pp.48-9; 中譯本見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譯，《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44-45。

費取到一份。……實開我國政府注重從事財經調查的先河」。(5)

北京政府傾覆後，端納受國民政府聘任為工商部經濟報導局做宣傳工作。1928年秋，經羅文幹介紹，到關外任張學良顧問，九一八事變後，於1933年陪同張氏遊歐；1934年任蔣介石顧問。最後於1940年離開中國，遊歷南洋諸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菲律賓被日本軍俘虜，匿名於戰俘營數年，戰後因病被送到檀香山美軍醫院治療，1946年3月回到上海治病，11月逝於中國。端納主要生涯在中國度過，一生充滿傳奇性，牽涉到現代中國許多政壇內幕，其中尤以協助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最為膾炙人口。對於這麼一個貫穿民國初年到三〇年代中國權力核心的外籍顧問，自然是探討「外籍顧問與近代中國」時，受到矚目的人物。然而他在華的活動，沒有留下多少記錄，至今只有他在夏威夷養病時，口述的一本英文小冊子 *Donald of China*。這本書完全依賴回憶，只能看出其在華的大致經歷，對歷史研究幫助有限；加以端納接觸的常是政壇內幕，往往沒有留下文字記載，常使研究者有無從下手之感，使得至今我們對端納的瞭解仍十分有限。

筆者負笈英倫時，曾想從英國外交檔案中入手，爬梳端納在華的作為。然而在英國公共檔案局 (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London) 找尋與端納有關檔案時，發現有關端納的文件，常有目無文，索引目錄中查得到號碼的文件，檔案匣中常是付之闕如。現僅能依據英國外交檔案 FO371 中找到的少數文件，及英國 1926-1933 年駐華公使藍普森 (Miles Lampson) 日記，考察北洋政府最後階段，即張作霖任安國軍總司令及軍政府大元帥時期，端納在張氏與英國駐華使館中扮演的角色。希望能依據第一手史料，為端納在華神秘的顧問生涯，做出一點基礎研究，幫助我們瞭解端納與張作霖的關係，及北洋政府末期的中英關係。

張作霖掌控北京時，端納是北京內閣顧問，兩者之間如何建立關係，因無史料記載，不得而知。只知道端納甚受北京政府信任，*Donald of China* 書中稱 1927 年初，張作霖免英籍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 (Francis Aglen) 時，曾想以端納繼任總稅務司一職；不久，又要他任鹽務稽核總所會辦一職。端納對這兩個高薪職務，都拒絕了。(6) 據英方史料，端納在張作霖與英國新駐華公使藍普森之間，扮演了相當微妙而重要的角色。藍普森早在 1916--1920 年任北京使館參贊時，就與端納熟識；1926 年底他抵華履任，其夫人記事本中記載，1927 年初

5. 胡光應《影響中國現代化的一百洋客》(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92 再版) 頁 146。

6. 徐慰曾等譯，《端納傳》，頁 252-3。

兩次邀端納吃飯。<sup>(7)</sup>該年夏，藍使曾想用端納來促成南北停戰。先是，張作霖於4月6日搜查北京俄國使館；六天後，上海實行「清黨」，倫敦認為北京與南京都「反赤」了，實無再戰之必要，遂熱心撮和張、蔣和談。5月中旬，藍使赴上海會見「上海防衛軍」指揮官，行前他與張作霖及梁士詒談及南北和議之事，告訴張、梁，若有機會見到國民黨中穩健派的朋友，他願私下撮合南京、北京的合作。<sup>(8)</sup>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成立軍政府，自任大元帥，以反赤為號召，並派人到南京建議成立反赤聯盟。藍普森認為機不可失，7月7日電英國外交部，稱：

我並不想亂提建議或引起不實的期望，但是若有任何我認為調停各方合適的時機來臨，你是否同意我派遣私人使節，以完全非官方的身份，表面上從事其私人事務，到全國各地去試探各方意見。在我心中，有一個顯然合適的英國人，他是所有交戰派系都歡迎的人物；我相信只要我要求並準備好負擔旅行開銷的話，他就可出發。他對中國微妙的調停很有經驗，我自1916年就與他熟識。我完全信任他，認為他不僅在中國是消息最靈通者之一，也是有最好及最理智影響力者之一。他在1911年辛亥革命時扮演過重要角色，並在某種程度上指導該革命；他在革命黨中與北方同受信任。現在時機尚未完全成熟，但也許不太遠了。我要做的是由雙方邀請我來安排見面，但我寧願先看我們的試探的結果，再決定具體的辦法與步驟。

電文中雖未明揭密使之名，但由文義看，幾乎可確定藍使所指就是端納。英國外相張伯倫 (Austen Chamberlain) 要部屬提意見，結果遠東股 (Far Eastern Department) 的中國專家 John Pratt 寫道：「藍普森未指明他心中想的是誰，但是我相信任何在華外國人，都無法掌握中國政壇的陰謀詭詐。我懷疑有任何這樣的一個人，可以做任何有益的事」。最後，倫敦於14日指示藍使云：「你的建議經仔細考慮後，我們覺得太過投機也太危險了」。<sup>(9)</sup>此事遂寢。

張作霖曾不斷要求英國援助他，都遭婉拒；9月他又想透過端納取得英國

- 
7. Year by Year working diary (Rachel Lampson), 25 Jan., 25 Feb. 1927-Donald, Lampson's Paper；藏於英國牛津大學安東尼學院 (St. Antony's College)。
  8. Lampson to FO, 13 & 16 May 1927, FO371/12405 [F4614/F4616/F4663/2/10]；參見筆者〈英國與北伐時期的南北和議 (1926-1928)〉，《興大歷史學報》第三期，1993年4月，頁129-139。
  9. Lampson to Austen Chamberlain, 7 July, 1927, FO371/12509 [F6118/6118/10]。

軍事援助，及爭取英國資金投資東北。30日藍普森電倫敦，稱：

端納今晨來訪。他受安國軍之託，問道：「是否可由英國得到戰爭物資，尤其是砲艇。我瞭解雖然受限於軍火禁運，要從法國或義大利方面獲得這些物資並不難，但是安國軍更想得到英國物資，這有任何可能嗎？」我回答說不可能。然後他以很含混的方式，提及有興趣的英國資金投入滿洲的可能性？滿洲為中國最富庶地區，為何英國資本不像在中國其他地方般投資於滿洲？日本一再宣稱滿洲在經濟上向任何人開放，因此若英國資金進入，日本人應不會抱怨。他指的應是類似英國對哈爾濱到漠爾根鐵路（濱黑路）的墊款。我婉拒了。……端納又泛泛提及：安國軍對英國政府在修約方面進行緩慢感到失望。他顯然受托傳達這一點。我告訴他，我已解釋過這令人洩氣的事，但只要北京政府派人來談，我隨時可開始談。……端納又轉話題於滿洲金礦，他日前提過此事。他告訴我，他見過楊宇霆，告以倫敦公司不會投資於此，楊同意放棄此計畫，原先的草案作廢。我告訴他，我從頭到尾反對此事。

英國外交部遠東股員 Toller 批註意見云：「端納看來成為張作霖的走狗了。我很驚訝他成為武器交易的中間人，〈曼徹斯特衛報〉會怎麼說？建議英國貸款濱黑路，顯示張作霖十分想表明他對日本的獨立」。<sup>(10)</sup>

張作霖在1927年底曾想以英國為「老大哥」，端納也介入此事。1927年11月28日藍普森日記記載：

六點，吳晉來訪，要求英國在北方成功的穩定了軍事地位後，指導北方。我很同情，但是未做任何承諾。他剛走端納就來了，告訴我此事之原委：楊宇霆及其週圍的人相信北方唯一的希望，是得一強國為其顧問和朋友，經考量後，認為英國是唯一抉擇。實在很難即刻回覆這個令人驚駭的建議。一方面，這對英國及英國資金在華北可能意義重大；另一方面，此事很容易扯上政治，違反我們不介入中國內政的宣言。<sup>(11)</sup>

1928年5月3日，北伐軍與日軍在濟南發生衝突後，9日張作霖發出通電，呼籲南京政府息爭禦侮。並試圖透過端納影響英國，促使地方實力軍人響應。10日藍普森在日記中寫道：

10. Lampson to F. O., 30 Sept. 1927, FO371/12457 [F8921/251/10]。  
11. Lampson's Diary, 28 Nov. 1927, Lampson Papers。

羅文翰剛走，我收到端納的信，內附一個電報稿--不清楚來源，我想是北京內閣--要求我經由香港總督送交李濟琛。內容是：張作霖已通電和平，要李立即回應。我告訴端納，我不能送任何這樣的訊息，他自己決定選擇其他管道。<sup>(12)</sup>

端納仍是想辦法電香港總督金文泰 (Cecil Clementi)，藍普森電倫敦，稱廣州總領事白利安 (John F. Brenan) 報告香港總督轉到來自北京內閣顧問端納的電報，云：

正式要求我交給你以下：「張大元帥發表通電，提出在嚴峻外交情勢下，他命令在京漢、正太鐵路戰勝的軍隊停火；願意傳達政治訊息給人民。請轉同一訊息給李濟琛，並促使他立即回應」。我知道沒有你的指示我不會行動。<sup>(13)</sup>

藍普森立即訓令廣州：「別行動。端納要求我傳達相似的訊息給李濟琛，我拒絕了。僅僅是傳遞訊息，也可能會被誤解，控告我們支持北方。北京政府有許多自己的管道，可以傳送訊息。」遠東股員 Toller 批註稱：「明顯的有人要求 Mr. Brenan 將張作霖的和平建議轉給李濟琛。Lampson 斷然拒絕與此事有任何關聯，這是個骯髒的詭計」。<sup>(14)</sup>不久，張作霖退出關外，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

### 三、張作霖的英籍軍事顧問沙敦

沙敦 (Francis Arthur Sutton 之音譯，通稱獨臂將軍 General Sutton--One-Armed Sutton) 是張作霖唯一稍具知名度的英籍軍事顧問。張作霖的英籍軍事顧問很少，也較不爲人所知。就筆者所見資料，僅有沙敦及 1922 年前後的 Captain MacKenzie、1928 年的 Mr. Talbot-Lehmann 兩名飛行教練。而後兩者在華時間較短，影響很有限，只有沙敦自 1922-1927 在奉軍服務，官拜少將，比較重要；但是遍查中文史料，都找不到相關記載。只有依據英國 FO 檔案，及英文

---

12. Lampson's Diary, 10 May 1928。

13. Lampson to F. O., 13 May 1928, FO371/13167 [F2395/7/10]。

14. Lampson to F. O., 12 May 1928, FO371/13167 [F2370/7/10]。

書籍所載，拼湊出他在奉軍中的活動情形。<sup>(15)</sup>

沙敦是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的好朋友，<sup>(16)</sup>於歐戰期間負傷，失去右手前臂。戰時他與發明 Stokes 迫擊砲的 Stokes 一起工作，並改良該迫擊砲砲彈，大幅增進該砲性能。Stokes 為回報其貢獻，給予沙敦在美國與遠東製造該砲的權利。戰後沙敦先到美國製銷迫擊砲，但美國政府以其索價過高，未同意沙敦設廠。沙敦遂來到中國，與吳佩孚接洽後，先到四川重慶兵工廠，準備製造迫擊砲。後因四川軍人內戰，沙敦被迫離開。<sup>(17)</sup>沙敦在四川時以作戰勇敢聞名，曾在戰鬥中擊斃一名中國將軍，在重慶兵工廠防衛戰中，英勇的對抗數倍的敵人，其英勇的傳奇事蹟，成為當時在華西方人眼中的英雄。<sup>(18)</sup>

1922 年冬，沙敦受聘到奉天，當時張作霖正整軍經武，想湔雪第一次直奉戰爭戰敗的恥辱，重點工作之一就是將奉天軍械廠擴建為「東三省兵工廠」（一般稱為奉天兵工廠）。<sup>(19)</sup>沙敦被張作霖任命製造迫擊砲及砲彈，他改裝北大營附近廠房，到上海購機器原料，建立一個小迫擊砲廠。並用水管名義向國外進口鋼管，改裝成迫擊砲。<sup>(20)</sup>英國公使館武官於 1923 年底有對此迫擊砲廠極詳盡之報告，稱該廠之配置、整潔及系統化的製造程序，可稱中國第一。產能達到日製迫擊砲三門，砲彈 500 發。<sup>(21)</sup>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迫擊砲發揮很大的功效，幫助奉軍獲勝，張作霖升沙敦為少將，並賞金二十萬元。<sup>(22)</sup>

- 
15. 中文有關東北軍和奉天兵工廠資料，如王鐵漢《東北軍事史略》，陳修和〈奉張時期和日偽時期的東北兵工廠〉，《文史資料選輯》第 25 輯，等都無沙敦之記載。英文有 Charles Drage, General of Fortune: the Story of One-Armed Sutton, London, 1963；及 George Woodcock, 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 London, 1969，兩書有較詳細記載。
16. Charles Drage, General of Fortune: the Story of One-Armed Sutton, London, 1963, p.229。
17. Military Attache to Macleay, 12 Nov. 1923, FO228/3108 p.179。參見陳存恭〈民初陸軍軍火之輸入〉，《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期，頁 243，註 24。
18. George Woodcock, 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 p.85。
19. 陳修和〈奉張時期和日偽時期的東北兵工廠〉，《文史資料選輯》第 25 輯，頁 150。
20. Note on General Frank Sutton, MC, War Office (Major Phillips to Mr. Bland), List. 171/16/MI50, 20 Oct. 1927, FO371/12513 [F8375/7937/10]。及王鴻賓編《張作霖和奉系軍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 120。
21. Military Attache to Macleay, 12 Nov. 1923, FO228/3108 pp.181-3。
22. Note on General Frank Sutton, MC, War Office (Major Phillips to Mr. Bland), List. 171/16/MI50, 20 Oct. 1927, FO371/12513 [F8375/7937/10]。

當時英國政府執行對華軍火禁運，並嚴禁英國軍人為中國服務。<sup>(23)</sup> 1922年10月26日英國駐奉天總領事威金遜(F. E. Wilkinson)即報告北京英使館，稱沙敦為張作霖工作。<sup>(24)</sup> 12月威金遜又報告：沙敦幫助張作霖製造武器，Captain MacKenzie任飛行教練；供稱：「若他們違反樞密院敕令(Order in Council)或軍火禁令(Arms Regulations)，我會採取行動」。<sup>(25)</sup> 英國駐北京使館1923年初報告倫敦稱：「奉天兵工廠將近完工，機器來自德國與日本……。有四十外國人在廠工作，主要是日本人，7個俄國人，1個英國人沙敦」。<sup>(26)</sup>

但是英國對沙敦的態度頗堪玩味，北京使館於1923年4月17日去信指示威金遜若有必要，就要警告沙敦。威金遜覆函稱沙敦雖為張作霖製造武器，但材料皆購自中國，並未違反禁令。而且認為因尚未被警告，使沙敦無警覺，行事較不隱密。並提及沙敦還與黑龍江督軍吳俊陞在黑龍江中開採沙金。威金遜認為沙敦在奉天的作為，在許多方面符合英國利益；例如許多兵工廠的設備向英國公司購買。最後總結云：「當然，如果公使仍認為我應警告沙敦，我會這麼做。沙敦知道如果戰事發生，他應當立即辭去工作」。<sup>(27)</sup> 英國使館回覆，同意沙敦之活動未違反禁令。<sup>(28)</sup> 5月，威金遜又報告沙敦的迫擊砲廠已開始生產了，雖違反英國專利權，但無人控訴；他尚未依使館訓令警告沙敦，但密切注意其行動。<sup>(29)</sup> 英國使館認可其作法。<sup>(30)</sup> 1925年威金遜報告，稱沙敦的英國商人朋友們對他頗有微詞，因為他訂購太少英國貨，反而多用德國貨。<sup>(31)</sup>

除製造迫擊砲外，張作霖也利用沙敦與英國使館聯繫。1925年夏，張與馮玉祥不和，曾派沙敦到英國使館，要求英國援助對抗馮玉祥及其俄國盟友。英

23 參見陳存恭《列強對華的軍火禁運(民國八年--十八年)》(台北：近史所，1983年)。頁265-266，附錄四〈一九一九年六月二日，英駐華公使朱爾典於英國政府授權下所頒布之對中國禁運軍火的英王律令〉。英國政府所頒樞密院緊急敕令(Order in Council)多次重申此禁令。

24 Wilkinson to Clive, 26 Oct. 1922, FO228/3106, p.197。另於11月6日又有類似的報告。見FO228/3106, p.224。

25 Clive to F. O., 27 Dec. 1922, FO371/9196 [F389/48/10]。

26 Clive to F. O., 12 Feb. 1923, FO371/9197 [F941/48/10]。

27 Wilkinson to Hubbard, 21 April 1923, FO228/3107, pp. 265-7。陳存恭，前引書，頁151。

28 Hubbard to Wilkinson, 24 April 1923, FO228/3107, p. 263。

29 Wilkinson to Macleay, 1 May 1923, FO228/3107, p.281-3。

30 Macleay to Wilkinson, 9 May 1923, FO228/3107, p.287

31 Wilkinson to Valairet, 24 Sept. 1925, FO228/3112, pp.269-272; 陳存恭，前引書，頁201。

國代辦報告稱：「我告訴他英國不會支持任何一個中國派系。……沙敦說英國不支持的話，張就不會行動。我想這是敲詐」。<sup>(32)</sup>該年，直隸督辦李景林及山東督辦張宗昌邀沙敦去天津及濟南設廠製造迫擊砲，他看在高薪份上答應了，張作霖大怒，認為沙敦背叛。後因戰爭再起，該建廠計劃取消，但沙敦已失去張作霖信任。<sup>(33)</sup>沙敦並有意在青島與其他人合購跑馬場，預備設立一所英國學校，好大賺一筆。<sup>(34)</sup>

沙敦野心頗大，想當東三省兵工廠廠長，並因此與楊宇霆交惡。1925年9月楊宇霆出任江蘇督辦，沙敦要求取而代之，接任兵工廠廠長；後因日本反對未果。此舉加深了他與楊宇霆長期以來的不和；楊是張主要幕僚，不想失去對兵工廠的控制，運動沙敦失去原來砲彈及迫砲廠經理職務。<sup>(35)</sup>1925年11月威金遜報告，稱沙敦兩週前在濟南遇刺受傷。沙敦認為主謀是張的俄國顧問Merkuloff。倫敦外交部遠東股股員 F. Gwatkin 批註意見云：「沙敦的一生，是個遠超出編劇夢想的羅曼史，這事只是個小插曲」。威金遜同時報告：沙敦與楊宇霆交惡，自楊從江蘇北返後，使沙敦喪失了張的顧問之職。<sup>(36)</sup>加以郭松齡灤州回師時，沙敦認為張一定完蛋，堅持張作霖付清薪水，張對他更不信任。<sup>(37)</sup>但是張作霖不願讓沙敦跑到對手處工作，仍保留沙敦在奉軍中，並任命他建新兵工廠。1926年1月11日，英國駐北京公使麻克類 (Ronald Macleay) 報告：「我今天得知沙敦被張作霖重新任命為兵工廠經理。楊宇霆堅持要免沙敦職，據說他以去就向張力爭」。<sup>(38)</sup>威金遜也報告稱：「沙敦被重新任命，在他與張會面後，他反駁所有對他的指控；但麻煩尚未了，楊宇霆仍反對他留任，不肯回到總參議之職」。<sup>(39)</sup>

沙敦與日本人也和，1926年1月中旬郭松齡之役後，威金遜報告稱：

日軍已退。沙敦被免職是楊宇霆主使日本軍事顧問所為，與日本政府不一定有關。眾所周知，沙敦與日本人不和，並非個人原因，而是因為任何外國人都會向本國而非向日本購料，沙敦亦然；因此日本人反對他出

32 Palairt to F. O., 1 July 1925, FO371/10920 [F2780/2/10]。

33 同註22；及 Wilkinson to Valairt, 24 Sept. 1925, FO228/3112, p.269。

34 Wilkinson to Valairt, 24 Sept. 1925, FO228/3112, p.270。

35 同註22。

36 Peking Chancery to F. E. Dept., 27 Nov. 1925, FO371/11675 [F199/199/10]。

37 同註22。

38 Macleay to F. O., 11 Jan. 1926, FO371/11656 [F1000/10/10]。

39 Macleay to F. O., 18 Jan. 1926, FO371/11656 [F1009/10/10]。

任地方兵工廠的廠長。到去年底為止，所有火藥進口都來自日本或日本在安東的工廠，近來沙敦以低得多的價格向挪威進口。<sup>(40)</sup>

因沙敦曾投資一家挪威公司，為兵工廠買大批火藥，大賺了一筆。<sup>(41)</sup>

沙敦最後在1927年初辭職了，新兵工廠尚未完工，張作霖付給他所有答應付的錢。1月13日，藍普森報告：「沙敦幾天前告訴我，他預期在北滿會有反張作霖的麻煩，拒用奉票；沙敦即將離華回英」。<sup>(42)</sup>15日又報告稱：「在沙敦指示下，他的新兵工廠停工了。這工廠機器已裝妥，但尚未運作」。<sup>(43)</sup>3月9日，藍普森電告倫敦：「我3月8日見到沙敦，他從瀋陽回來，他說他已從今年初起確定辭去張作霖處的工作。他暫時留在中國，處理在瀋陽的私人事務，約在二、三個月內離華。」<sup>(44)</sup>

沙敦為張作霖工作，曾遭英國國會議員質詢，給倫敦外交部帶來不少困擾。1927年3月初，倫敦外交部得到消息，將有國會議員要質詢沙敦之事；立即電北京，詢問藍普森：「沙敦還在為張作霖工作嗎？你認為他的地位是否違反樞密院敕令 (Order in Council) 第75條？」<sup>(45)</sup>

藍普森答以沙敦已辭職，即將離華，並稱：

他說他是為一份薪水工作，他從未參加任何戰鬥，僅有一次在郭松齡之役時到過前線。依上述資料，我不確定他觸犯第75條，我必須先與刑法律師 (Crown Advocate) 諮商，然後再表達意見。但是他已離開張作霖軍，我想我們不必再深究此事。我告訴沙敦你的詢問，並暗示他若離開，則不追究。他明白他為張工作，會使英國政府在抱怨俄國人為廣東服務時感到為難。他希望他的離開，可以達此目的。

40. 同上。

41. 同註22。沙敦並否認有進口軍火之事，1925年春自挪威進口火藥，是由奉天當局經手，見 Wilkinson to Valairet, 24 Sept. 1925, FO228/3112, pp. 271-272。

42. Lampson to F. O., 13 Jan. 1927, FO371/12398 [F326/2/10]。

43. Lampson to F. O., 15 Jan. 1927, FO371/12491 [F1948/1948/10]。

44. Lampson to F. O., 9 March 1927, FO371/12492 [F2185/2019/10]。

45. F. O. to Lampson, 2 March 1927, FO371/12492 [F2019/2019/10]。

遠東股員 Toller 批註：沙敦辭職可去除我們的為難。<sup>(46)</sup> 1928 年 2 月國會議員又一次質詢是否有英國人涉及中國內戰。外相張伯倫答以：目下無英國人在中國內戰中的軍中。提及沙敦與 Mr. Talbot-Lehmann（曾為張學良訓練空軍）兩個人的名字，但強調兩人都被正式警告以 1925 年樞密院敕令的條文。<sup>(47)</sup>

沙敦離華回英國時，路過日本；在接受報紙採訪時，主張中國收回俄國在中東路的特權。英國外交部收到駐東京使館的報告後，遠東股 K. R. Johnstone 批註云：「日本人不喜此論，因為俄國特權一去，日本在南滿亦不可免」。另一股員 Gwatkin 則云：「沙敦將軍的個性引人入勝 (picturesque personality)，但完全不懂國際關係」。<sup>(48)</sup> 英國陸軍部 (War Office) 在沙敦檔案中總結稱：

他從未一絲絲影響過張作霖的政策；張曾用他當與英國使館的媒介，以與英國駐北京公使，也許還有他國公使，來往。他也為張寫過反蘇宣傳文章刊在外國報紙上，但明顯的很多文章只是藉他之名，實際上是別人寫的。事實上沙敦除了兵工專家自身純技術專長外，對中國軍事情況幾乎一無所知。他不懂中文，從未被張諮詢過軍事行動。他與奉天兵工廠無關，對兵工廠而言，他甚至連入場權都沒有。有人控告他走私軍火，但就目前所知，他在瀋陽工作，很難被說成是違反樞密院敕令，除了有一次他投資一家挪威公司（但挪威非軍火禁運國之一），為兵工廠買大批 TNT，獲利由他和公司按出金比例分了。<sup>(49)</sup>

#### 四、結語

張作霖是最後一個控制北京政府的所謂軍閥，他自 1925 年底起，積極尋求英國財政上與精神上的支持，以爭取對北京的控制。他宣稱能維持和平與秩序，尊重條約，堅決反赤；當時國民政府聯俄容共，攻擊英國帝國主義，張認

---

46. Lampson to F. O., 9 March 1927, FO371/12492 [F2185/2019/10]。結果議員 Oliver 於 7 日質詢外相：沙敦為張作霖服務，是否違反 the China Order in Council？外次 Locker-Lampson 答以：我手邊資料不全，正在等完整報告；見 Parliamentary Question, 7 March 1927, FO371/12492 [F2219/2019/10]。

47. Parliamentary Question, 20 Feb. 1927, FO371/13223 [F895/895/10]。

48. Tilley to F. O., 15 June 1927, FO371/12464 [F6546/542/10]。

49. 同註 22。

為英國理當支持他。不少在華英國商人及外交人員確實很欣賞張作霖，要求倫敦給予支持。但倫敦不相信張有能力統一全國，非英國想要的如袁世凱般的「強人」。而且英國外交部自1926年起，認定國民政府勢必興起，努力尋求與國民政府中所謂「穩健派」改善關係，同時淡化與北京政府的關聯，對華改採嚴守中立不介入內戰的政策，屢拒張的請援。因此張作霖覺得被英國忽視，雙方關係在1927年初一度緊張，演成免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職的衝突。後來雙方妥協。3月底，發生南京砲擊案，4月初，張作霖搜查北京俄國使館，英國曾對國民政府失望，有轉而支持張作霖的趨勢。然而12日「清黨」，使英國回心轉意。此後英國希望蔣、張合作，不再禁止英國民間對張的私人借款。

張之積極尋求英國支持，與其在東北特殊外交處境有關。他與俄國交惡，堅決反赤，並為中東路時起衝突。日張關係則錯綜複雜，基本上，日本希望張留在東北，在其控制之下；不願見張逐鹿中原，入主北京，脫出其掌控。1925年後，張捲入北京政爭日深，雙方衝突漸增；張也越來越尋求西方支持。<sup>(50)</sup>英國外交部認為張作霖在國內代表過時的保守力量；國際上，與日、俄不睦，這兩個敵人都太強大，張完全沒有勝算；因此雖同情，但不能支持他。只有私人層次的活動，端納與沙敦就是最好的例子。

端納和沙敦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傳奇人物，端納「以一介洋客，二十八歲即來華，輾轉南北，垂四十餘年，周旋於君主與共和首領、官僚、軍閥、政客之間，備受尊崇。功績之卓著，事蹟之傳奇，實為歷來洋客中所僅見，尤以協助營救蔣公西安脫險一事，最為人所稱道」。「可稱我近代顧問中之顧問，也是中國人的一位可信賴的外國朋友」。<sup>(51)</sup>在北洋末期，端納任北京內閣顧問，同受張作霖與藍普森信任，在張與英國公使間扮演橋樑角色。由有限的一手史料看，端納曾助張作霖向英國求援；五三慘案後，協助張南北停戰；很可能英國公使曾想以他為調停南北特使。端納的主要關懷似乎在反日，對中國有親切感，希望中國統一強大，是中國的友人。

沙敦則是典型的投機客，行事純為個人利益。他以兵工專家被聘到奉軍中工作，但與同僚處不來，並未進入張作霖的決策核心，也未能助張得英國援助。但其在華事跡：

最為軍閥混戰時期的中國通們 (old China hands) 所津津樂道，在許多人心中，他個人無法模仿的體現了一九二〇年代中國的氣氛。……他介

50. Gavan McCormack,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8-1928: China, Japan, and Manchurian Idea, Folkstone, 1977, p.215。

51. 胡光鷹《影響中國現代化的一百洋客》(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92再版)，頁149及145。

入中國內戰，也許讓英國官方傷腦筋，但在上海英國社會中廣受歡迎；他常南下參加賽馬，有次獨得三萬英鎊賭馬獎金，被記憶為英雄應得的勝利。像沙敦這樣的人，不只因其英勇而被崇拜，他們對軍火貿易也有貢獻。<sup>(52)</sup>

當時，英國政府禁止英國軍人為中國服務，但仍有少數英國軍人為賺錢到中國投機，而英國為了本身利益，似乎也不是十分嚴格執行禁令；<sup>(53)</sup>沙敦的經歷，應是一個有趣的個案。

---

國立中興大學



52 George Woodcock, 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 p.85。

53 陳存恭，前引書，頁 151。

## Chang Tso-Lin's British Advisors--W. H. Donald and F. A. Sutton

Chi-hua Tang

### Abstract

Chang Tso-lin has long been deemed as the running-dog of Japanese imperialist, but this stereotype has been challenged by recent researchs. During Chang's dominance on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26-1928, he strived very hard to gain the favour of Britain. This research on the activities of his two major British Advisors, W. H. Donald and F. A. Sutton, may help us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Warlords and Foreign Power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